

《诗经·黍离》主旨辨正

杨淑鹏*

(晋中学院 中文系,山西 榆次 030600)

摘要 《黍离》是《诗经·国风·王风》中的名篇,其主旨历来众说纷纭,大致有“闵宗周说”“伤时追怨说”“请秦归旧都于周说”“伤周室不竞说”“迁都说”“卫寿闵兄说”“伯封思兄说”“念乱说”“忧小人之酿乱说”“王室之不振说”等十种说法;20世纪以来,学人又频增新见。考辨诸说,探究“黍稷”意象在《诗经》中的象征意义,以为依《毛诗序》“闵宗周说”更符合诗作原意。

关键词 《诗经》;《黍离》;中日韩《毛诗序》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20)03-0014-07

DOI:10.16275/j.cnki.ywxk.2020.03.004

《黍离》是《诗经·王风》的第一篇。根据《诗经》编排规律,一般排在每部分之前者,都是该部分中最主要的篇章,因此历代倍受人关注,异说自然也较多。20世纪的一批学人,则对传统的《诗经》诠释做出了全面颠覆,务求冲破“旧经学”的范围,还《诗经》以文学的本来面貌,就诗论诗,各奋私智,故而在短短不到百年之间产生的新说,就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两千年。郭沫若认为是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1] [P208]},蒋立甫认为实际是旧贵族“感伤本阶级的没落”^{[2] [P73]};陆侃如、冯沅君^{[3] [P36]},程俊英、蒋见元^{[4] [P194]}以为写迁都时心中的难受;余冠英^{[5] [P72]}、褚斌杰^{[6] [P181]}、金启华^{[7] [P150]}、李蹊^[8]等以为是流浪者讲述他的忧思;郭晋稀以为是卫人流滞王城者所作^{[9] [P73]};蓝菊荪认为是怨战之作^{[10] [P215]};叶知秋以为“为人类千古之问——‘我是谁’而作”^{① [11]};其他还有“情诗说”^②,“奴隶号叫说”^[12],“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哀号说”^[13],“下层官吏怨刺说”^[14]等。统纲这些新说,有其共同的时代特点:一、基本不考虑秦汉经师传说与史籍的相关记载;二、基本不考虑前贤的研究成

果;三、唯创新是务,把标新立异作为追求的方向。这种风气风行百年,至今未沫。虽说20世纪的革命思潮,对于冲垮旧的学术格局产生了积极意义,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迅猛发展,但毕竟也留下了诸多遗憾。要想对《诗经》做出合理的解读,还必须全面综合分析前贤的研究成果,从其所善,补其不足,从而做出新的探讨。故本文首先要对两千多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做全面的梳理。其次分析其得失,找出新解决途径,以求通过对《黍离》创作主旨的探讨,深化文本研究。

一 《黍离》主旨旧说十种

笔者详考两千多年来中日韩三国300余学者对《黍离》主旨的研究,特就其歧说缕析于下。

一、“闵宗周”说

此说首倡于《毛诗序》,其曰:“《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15] [P5]}孔颖达疏解其意说:“……周室颠覆,正

* [收稿日期]2020-01-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日韩诗经百家汇纂”(10&ZD101)

[作者简介]杨淑鹏(1978—),女,山西吕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唐前文学。

① 冯现冬《对生命本体存在的千古追问》(《名作欣赏》2016年第10期)也有类似的观点。

② 许永强《〈黍离〉是一首爱情诗》一文中以为,“这首爱情诗分三章,皆以离离成行的黍稷起兴,写一青年因爱恋着一个姑娘而不可得的愁郁心绪”(《韩山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

谓幽王之乱,王室覆灭,致使东迁洛邑,丧其旧都,虽作在平王之时,而志恨幽王之败,但主伤宫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为平王诗耳。又宗周丧灭,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15] [P5]} 这里重点强调几点:第一,创作时间在平王时;第二,创作事由为西周王室覆灭;第三,表达的情感是闵伤宗周,而非刺幽王,更非刺在朝天子平王。这一观点,基本上代表了汉唐持毛说的基本认识。历代注家遵从其说者最多,如苏辙、李樗、范处义、戴溪、许谦、梁寅及日本中村之钦、冢田虎、东条弘、安井衡等,李朝朴世堂、金钟厚、申绰等,皆从其说。有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还做了细化研究,如魏了翁将“闵宗周”具体为“闵伤幽王”^{[16] [P407]},丰坊则说“王世子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于洛,尹伯封过西都而伤之,赋《黍离》。”假托申培说,将行役周大夫确指实为“尹伯封”,行役事确指为“犒秦师”,“幽王伐申,申侯逆战于戏,射王,杀之。立平王于申,迁洛,命秦伯帅师逐犬戎于镐京。寻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师,过故宗庙宫室,咸生黍稷,闵王室之颠覆,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诗”^{[17] [P647]}。

二、伤时追怨说

首倡此说的是朱熹,是在“闵宗周”说的基础上滋生出来的。他以为此诗“既叹时人莫识己意,又伤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18] [P42]},即伤时与追怨双重主旨说。顺“叹时人莫识己意”思路,严粲《诗缉》做进一步发挥,确指“所伤”为时人浑然已忘亡国之痛的状态“周东迁而遂微,置丰镐于度外,盖秋风禾黍之感不接于目,日远日忘也。”^{[19] [P95]}朱善《诗解颐》又进而从诗中绎出了“怨时”的意义“行役之大夫苟无所见则已,既已见之,而且忧之,且追怨之,岂容付之无可奈何而已邪?谓宜请于平王,泣血尝胆,号令诸侯,整师缉旅,克复旧业。”^{[20] [P211]}而依“追怨”说,谢枋得《诗传注疏》把“怨”“恨”的矛头对准了平王“吾观《书》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为矣,所以训戒晋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国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兴废,悉置度外,文、武、成、康在天之灵必不乐矣!王畿乃天子自治之国,挈畿封八百里要地,悉付之他人”^{[21] [P237]}“秦人能以天王之仇为天下之同仇,平王不能以厥考之怨为一人之私怨,人之度相越如是哉!”而刘瑾直指褒姒母子“然则《黍离》之感慨,有不待于大夫行役之时,而已兆于褒姒母子僭乱之日。大夫追怨之词有所归矣。”^{[22] [P384]}朱善又将怨恨指向平王时群臣“为之臣者,又寂无一人以为言,则其偷安忍耻,颓堕委靡,岂特王之罪,亦群臣之

罪。”^{[20] [P211]}曹学佺说“诗人之追怨不但平王,而且及于幽王也,但不敢直指君父之恶耳。曰‘此何人哉’,又至再至三而曰‘此何人哉’,其意深矣。”^{[23] [P16]}沈守正《诗经说通》则说“旧说:人兼幽、平说。胡休复云‘东迁之祸,不在犬戎,而在艳妻媼处之日乎!’意更远矣。”^{[24] [P42]}显然,他们的关注点已不在“闵宗周”,而在致使宗周颠覆的根源。从经学意义上讲,这便大大前进了一步。

三、请秦归旧都于周说

宋王质《诗总闻》曰“当是东周怀忠抱义之士来陈秦庭,以奉今主归旧都为意,或以尊王室制诸侯为辞。往往有怪其久留不去者也,徒隐忧难明告。”^{[25] [P491]}潘克溥《诗经说铃》亦引此说以广见闻。因此说有过多的猜测性,故从之者少。

四、伤周室不竞说

此说始于季本,其《诗说解颐》说“旧说因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倾覆,彷徨不忍去而作。今以事理论之,似不尽然。当时周虽东迁洛邑,而岐周旧地尽封秦。假使故宫为其所毁,则都城之内宜为室庐,乃以黍稷为言,则当在野外之地,而岂可语于城内哉?且五谷者,民之所资以养者也,而称其黍稷之盛,则其民犹为勤力,似有叹羨之意,与言蔓草荆棘者不同矣。其必秦得岐周之后,务本力农,周大夫出过其地而见之,知秦地广民勤,将以富强雄天下,而伤周室之不竞乎!”^{[26] [P91]}季本以为《黍离》描述“黍稷”当为田中景,非废墟景,因此“黍稷”句为叹羨“秦民勤力”,以反衬周之不竞。何楷从是说。姚炳亦云“当时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及襄公讨西戎救周,乃以岐丰赐之秦,遂有宗周畿内之地。此本朝之赐,又未有数年,岂尽没其旧耶?故有谓与言蔓草荆棘者不同,其必为秦得岐丰之后,务本力农。”^{[27] [P447]}清李光地又演变出“周弱秦强说”,其《诗所》说“周室播迁,以其地界秦人,故曰彼黍之离离者如故,而稷且自苗而穗、自穗而实矣。古者尊黍而稷次之,于以见平王之不能复兴,而秦之渐强魄兆已见也。”^{[28] [P29]}

五、迁都说

以为《黍离》反映了平王为避戎寇,迁都洛邑的事件。宋张文伯《九经疑难》曰“《黍离》述其迁都之迹也,戒后君不救先君之弊。《易》不云乎‘有子考无咎。’有子,可托也。考无咎,得干也。宣、厉,其人也。宣为有子,厉全在雅。平同无子,幽平在风,戒也。处于《卫》下,何也?《郑》《卫》,亡国之音也。《郑》之上,《卫》之下,若曰《黍离》亦亡国之

音也。”^{[29] [P848]} 东迁而周室衰微,又有“闵东迁之失谋说”朱谋埤说“《黍离》,闵宗周也。何以闵?闵东迁之失谋也。西周政令所以能行乎诸侯者,非徒文、武、成、康之德,亦以地势险固,足食足兵,可以东制诸侯之命耳。幽王虽死骊山,犬戎无盘据丰镐之理,乃因一败遽尔东迁,有识之士于其行也,痛悼失图,故赋此诗:黍稷离离,下垂而硕,犹有忧者,中心思惟而倾其首也。”^{[30] [P562]} 傅恒亦曰“夫宗周者,是文、武所经营也,是成、康以来所世守也。宫庙陵寝皆在焉,土田上上,山川险塞,是天下之奥区也。犬戎作难,衅起一时,秦襄力战彼,亦自复其仇耳。为平王者,留晋文侯、郑武公夹辅周室,使襄公逐西戎而居之,则周可复兴,与宣王争烈矣!乃惧其侵暴而即安于东,举西京而畀之秦,异日者秦之代周实始于此。大夫行役兴怀,于彼黍彼稷者,伤周之物产而为秦之粢盛也,周之民人而供秦赋役也。呼苍天而问何人,盖叹平王君臣以国与人,不知谁实倡为此谋也,不然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举世皆知而又何问人哉?”^{[31] [P74]}

六、卫寿闵兄说

刘向《新序·节士》曰“卫宣公之子,伋也,寿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寿与朔,后母子也。寿之母与朔谋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也,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子乘舟》之诗是也。……于是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32] [P874]} 刘向诗学与鲁诗同源,故明清学者皆以此为鲁诗说。清儒治今文者多从其说。牟庭《诗切》言“今以诗意求之,定从鲁诗说为是,但其诗非寿子所自作,盖诗人咏其事而吊之,且以刺宣公也。”^{[33] [P700]} 冯登府《三家诗遗说》说“本欲杀伋而杀寿,故以黍、稷同时以喻兄弟起兴,不敢斥言君父,而呼诉于彼苍,孝子之思深矣。”^{[34] [P756]}

七、伯封思兄说

《太平御览》九百九十三羽族部引陈思王植《令禽恶鸟论》说“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35] [P316]} 曹植学《韩诗》,因此明清学者多以此为《韩诗》之说。范家相《三家诗拾遗》说“如鲁、韩,则此诗皆弟忧其兄之词,事适相类,而所传各异。但尹吉甫为王朝之臣,韩说犹为可通。”^{[36] [P548]} 牟应震、王先谦,日本诸葛晃、朝鲜李炳宪等亦证此说为是。

八、念乱说

时乱未艾,故忧患之,深思之。此主旨较合情理,但从者较少。清毛奇龄《国风省篇》说“《黍离》,念乱也。‘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园有桃,其实之肴’也。‘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心之忧矣,歌且谣’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其谁知之’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亦勿思’也。”^{[37] [P643]} 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卷二《黍离说》亦云“《黍离》作于已乱者也,故其辞哀。虽然,乱未艾也,故其思深。……然而《黍离》之诗人不暇责也,一则曰‘此何人?’再、三则曰‘此何人?’此何人盖即指晋文侯、卫武公、郑武公言之。何也?幽王事起仓卒,君灭国残,然四方及畿内诸侯无恙也,三君者皆同心讨贼,灭之绝之,修城池,建社稷宗庙而守之。周可以不东而卒东者,由郑桓公死难,武公内怛,不敢与犬戎抗;晋文侯、卫武公去西都千里,各顾其国,不为王室图久远也。夫皇父、荣夷,斫之于方茂者也,然皆纤才侈欲,容悦之徒而已。若三君者,天下仰望,为圣贤豪杰,王室所倚重,而乃至于此,不重可责邪?此《黍离》诗人之意也。”^{[29] [P458]}

九、忧小人酿乱说

清方苞《朱子诗义补正》中说“此诗似预忧小人酿乱而叹众人之愤愤,故呼天而问之:谓如此之人,何故使当要津以厚其毒也。”^{[38] [P410]} 与其说相类者是日本皆川愿《诗经绎解》,其云“此篇言从道者,悠久之业也。其间必不能无时生厌心焉,而其昏惑之际,必又有离贰之言出焉矣,是以预戒令究察以无陷夫邪途也。”^{[39] [P137-138]}

十、王室之不振说

胡文英《诗经逢原》曰“东迁之后,求赙、求车四出不已。诗人因久役而忧王室之不振也,赋《黍离》。”^{[40] [P421]} 清潘克溥《诗经说铃》中引《印古诗说》曰“《黍离》,隐然见天下多事,行役不息,以见王政之不纲也,未见宗庙夷毁之意。”^{[41] [P426]} 姜炳璋《诗序补义》说“不言悲而言忧,正以朝廷绝少中兴气象,胸中有一段光复旧物之志而不得舒,非徒下新亭之泪也。”^{[42] [P87]} 此说显然是从诗中体会而出的意思,并无史实根据。

二 《黍离》主旨旧说辨析

梳理历代《黍离》主旨旧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秦汉经师相传的旧说,如被认定为毛、鲁、韩三家的观点;二是在《毛诗》“闵宗周”说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诸说;三是自创的诸说。

自创之说主要有“请秦归旧都于周”“伤周室不

竟“述迁都之迹”“忧小人酿乱”等诸说。这几种说法一个共同点是：认为此诗与两周之际的某一政治事件相关，但纯是从诗中分析得出的一种可能性，并没有明确的史实作支撑。特别是王质的“请秦归旧都于周”与季本的“伤周室不竞”两说，颇类于小说虚构。故清顾镇《虞东学诗》驳季本说曰“《序》曰‘闵宗周’，而下言‘大夫行役至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季本谓‘以事理推之，未必尽然，所见黍离当在野外。’钱天锡亦谓‘岐周故地，尽以封秦，不应鞠为黍离。’此惑于郑氏《秦谱》横有西都八百里之说，以为秦不应毁废本朝宗庙宫室也。案《史记》：平王赐襄公岐以西之地曰：戎侵夺我岐、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是秦封在岐以西，丰镐在岐东，为戎所据，非秦有也。终襄公世不能克戎，至文公十六年，逐戎始得至岐。岐以东仍献之周，是丰镐故都仍隶周境，秦不得过而问焉。特为戎残破，平王视同敝帚，不复加葺，铜驼荆棘，固所不免。史言殷墟城坏生麦，则周墟黍稷理亦有之。”^{[43] [P440]}胡承珙引顾说亦云“虞东之说足破季本谓诗人见黍稷之盛，知秦地广民勤，将以富强雄天下，而伤周室不竞之谬论。”^{[44] [P164]}

从《毛诗》“闵宗周”说基础上衍生的观点，如追怨、念乱、王政不纲等说，这些观点与“闵宗周”并不相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毛诗》旧说的补充。现在需要关注的是汉代经师的旧说，因其渊源有自，须认真辨析。

首先看被认作《鲁诗》的“卫寿闵兄”说。主此说者中，属康有为最用力。康有为首先把“卫寿作诗”与《韩诗》的伯封作诗，通过考据并为一处，认为“伯封”是“卫寿”的字，鲁韩二说同源。而后否定《韩诗》之说曰“若吉甫西周贤卿，非同卫宣昏悖，安得伯奇未僭以前，遽以伯字其弟哉？”接着通过驳《毛诗》说，提出三点：一，东周初，镐京故地为戎所占领，大夫不可能出使至此；二，大夫长久滞留戎地，究竟为何呢？史无实据；三，《黍离》表达“隐痛难言”的特征，不合当时“变雅成规”的普遍诗风。^{[45] [P61-63]}可以看出康有为所用的是排除法，排除了毛、韩二家，旧说也就只剩《鲁诗》一家了。

康有为对《鲁诗》说的肯定，显然并没有新的证据，而对于《毛诗》的否定，其词亦甚为无力。《史记·秦本纪》对西周覆亡后的史实有具体交代：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攻入镐京，洗劫京都，秦襄公等带兵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襄王因此封为诸侯，平王许诺“戎无道，侵伐我岐、丰之地，秦能攻

逐戎，即有其地。”^{[46] [P179]}公元前766年，秦襄公讨伐西戎，到达岐山，襄公卒。公元前750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移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46] [P179]}西周覆亡仅仅二十一年后，部分失地收复，如此大的政治事件，周必会郑重对待，派大臣前去举行收复仪式，时间安排也应较为宽裕。至于《黍离》“隐痛难言”与“变雅”诗风相悖之说，笔者以为有机械之嫌。诗风深沉含蓄还是激切直露，固然与时代风气有关，也与作者风格密切相关。况东周初迁都重建，百废待兴，礼乐教化中成长起来的周贵族有忧思，更有励精图治、维护新王朝秩序之公心，因此不直斥在上者也在情理之中。

再看《韩诗》的“伯封思兄”说。胡承珙言“尹吉甫在宣王时，尚是西周，不应其诗列于东都也。”^{[44] [P164]}清龙起涛、民国马其昶、林义光等亦有同说。王先谦曾辨之曰“盖有传其亡在王城者，及平王东迁，伯封过之，求兄不得，揣其已歿，忧而作诗，情事分明，此不足以难韩说也。”^{[47] [P315]}似乎能圆“为何列入《王风》”之疑，但吉甫杀子在西周宣王时，宣王最后一年为公元前783年，距收复镐京失地公元前750年有33年，则伯封如受平王重任复归宗周，在宗周覆亡、东周尚待振兴、秦国壮大等一系列大的政治风云变幻中，心中最深切的悲痛仅为死去至少三十多年前的兄长，于情理相差甚远，其说不通。

下面再来分析《毛诗》之“闵宗周”说。第一，《史记·秦本纪》所载“秦收复镐京失地，还归周”为其说提供了史实印证的可能。诸注家明丰坊、张次仲、胡绍曾、清钱澄之、顾镇、胡承珙等皆以之证。史实较为有力，虽未直接载“作《黍离》事”，然从历史情境上是贴切可通的，周遣使臣归故都，亡国之痛、远离乡土之苦必激荡内心，痛而作《黍离》以抒怀。

第二，纵览历史，王朝更替之际，亡国主题往往是文学创作的主调。历代注家对此文学现象有所揭示，并从不同角度予以分析总结，如李资乾《诗经传注》从君臣大义上解读“卫受齐德，且欲厚报之。臣子受君恩，当何如报也？故受之以《黍离》。《黍离》之诗，忧周之丘墟，呼苍天而感叹也。”^{[48] [P321]}王鸿绪《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引辅广言与此意类“国家颠覆，在臣子故不能无所忧，此诗人忧之，得其正者也。”^{[49] [P220]}新王朝建立之初，一般会出现总结覆亡教训的社会思潮，李诒经以此为《黍离》创作动因，《诗经蠹简》说“此行役大夫慨叹故宫，以警后王之诗也。”^{[50] [P606]}当然江山易代、满目疮痍最是痛彻心扉，

不吐不快 正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文、武、成、康之旧,一旦灰烬 荡然无存。有心斯世者,所为目击心伤 不能无慨于其际焉。”^{[51] [P191]}

第三,《黍离》与闵商诗《麦秀之歌》创作风格相似。《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过故殷墟而伤之,作麦秀之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46] [P1621]} 宋李樾曰“箕子闵商之歌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既曰麦秀,又曰禾黍,则亦与此同意。”^{[52] [P181]} 认为《黍离》与之主题相似,皆为亡国主题,后魏了翁、江环、何楷、徐光启、张次仲、王鸿绪、姜文灿、陈大章、胡文英、邓翔、龙起涛、陈继揆、朝鲜朴文镐等皆从是说。但这些论家简略引证居多,详细阐释较少。从二诗文本来看,采用的“禾黍”“黍稷”意象属于同类,行文结构相同,先作物象描写,继之抒怀,且忧伤风格相似,这些应是诸家立论的关键依据。如顾镇所说“史言殷墟城坏生麦,则周墟黍稷理亦有之。”^{[43] [P440]} 许伯政阐述得比较透彻:“箕子《麦秀歌》,因见麦秀而作。则黍方布种,而承言禾黍油油,与此之因黍及稷,因苗及穗、实,皆感此以思彼,则知物态日新月异,故宫愈久愈湮,所谓百端交集,一往情深也。”^{[53] [P592]}

三 从黍稷意象进一步补证“闵宗周”说

《黍离》中的“黍稷”意象是传达“宗周覆亡”主题的关联点。历代对《黍离》中“黍稷”形象的理解有一个变化过程。孔颖达“过历故时宗庙宫室,其地民皆垦耕,尽为禾黍。”^{[15] [P5]} 范处义“闵周室者,黍、稷莫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54] [P95]} 刘元城“初见稷之苗矣,又见稷之穗矣,又见稷之实矣,而所感之心始终如一,不少变而愈深,此则诗人之意也。”^{[22] [P384]} 这些看法中,“黍稷”形象基本是实物特征。宋朱熹在解读《黍离》时,开始以文学视角切入对“黍稷”形象的分析和对全诗的理解“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兴”,“稷之实犹心之噎,故以起兴”,“赋其所见黍之离离与稷之苗,以兴‘行之靡靡,心之摇摇’”。认为黍稷具有比兴义,比兴忧情。到了明顾起元《诗经金丹》则将黍稷表达的比兴义与“宗周覆亡”主题联结在一起“总是赋所见以兴闵周之意,因致所叹以致倾周之人。”^{[55] [P367]} 郝敬《毛诗原解》亦云“平王东迁,丰镐丘墟,大夫过而伤之,以黍稷比即其所见也。”^{[56] [P297]} 顾起元等人似更能准确地说明《黍离》的创作宗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诗经》中“黍稷”意象入手,做深入分析。

《诗经》中涉及“黍稷”意象的共 16 篇,其中有“黍稷”联用的,也有单用的,特点有三。一,这些诗在主旨表达上有相对的稳定性,主要是与周重大政事相关的内容:农事、祭祀、战争、政事。二,意象写作手法上,可分为写实和象征两类。一类与农事、祭祀相关者 9 篇^①,为写实,如《七月》“黍稷重穋”,《大田》“与其黍稷”,《信南山》“黍稷彧彧”,《甫田》“黍稷薿薿”,《良耜》“黍稷茂止”,《楚茨》“我黍与与”“我艺黍稷”,《丰年》“丰年多黍多稌”等。另一类,与战争、政事题材相关者 7 篇,“黍稷”皆具有象征意义,展现着重大的政治背景。如《下泉》言“芄芃黍苗,阴雨膏之。”《毛诗序》说“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忧而思明王贤伯也。”^{[15] [P12]} 《黍苗》亦有“芃芃黍苗”之言,三家诗说“召伯述职,劳来诸侯也。”^{[15] [P806]} 《出车》言“昔我往矣,黍稷方华”,《鸛羽》言“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此二篇皆与战事相关。《硕鼠》言“无食我黍”,《诗序》言“刺重敛也”^{[15] [P16]}。《黄鸟》言“无食我黍”,又言“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毛诗序》:“刺宣王也。”《郑笺》:“刺其以阴礼教亲而不至,联兄弟之不固。”^{[15] [P58]} 三,运用象征手法的诗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出现了“黍稷”意象的重复使用,说明“黍稷”政事象征义在《诗经》中具有固定化倾向。

关于黍稷的象征意义,古代经学家早有所觉察,如宋蔡卞《毛诗名物解》:“凡言黍、稷者,皆有冀祖考、怀祭祀、念父母之意。”^{[57] [P545]} 清黄中松亦云:“《说文》《图经》《风俗通义》《尔雅翼》等书皆以稷为五谷之长,毋乃与圣言异乎?将稷与黍皆有益于民生而不可缺者,故古人多以黍稷并言,而皆可为长坎?”^{[58] [P282]} 黍稷之所以有此特殊的象征意义,主要与周人生活有关。黍、稷是周民族最重要的作物,周之先祖曰后稷,即反映了其以稷发家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周民族祖先稷活动的区域,稷和黍的遗址最多。^[59] 古以社稷代指国家权力,“社”代表土地,“稷”代表谷物,这种概念正是从周人开始的。正因为黍稷在周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其进入歌咏,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总览“黍稷”意象在《诗经》中的艺术特色,再反观《黍离》文本,诗总三章,将各章前两句摘录在一起,可以看作一首完整的“黍稷”农事歌:彼黍离离,彼稷

① 其中一篇《华黍》为笙诗,无辞,但《毛序》述其诗旨为“时和岁丰宜黍稷也。”且曰“《华黍》废则蓄积缺。”则其诗应与农事相关。

之苗;彼黍离离,彼稷之穗;彼黍离离,彼稷之实。描写了黍稷的成长、成熟过程。然通读全诗,显然不是农事诗、祭祀诗,故其意不在写实,而为虚写。元刘玉汝“故都兴亡盛衰之感皆在‘黍离’二语,而有无限悲怆之情矣。”^{[60] [P617]}明徐光启言“不见一‘宗周’字,亦不及一‘宗庙宫室’事,今俱就感黍稷而兴歌。”^{[61] [P182]}清牟应震《诗问》:“黍苗小,喻周黎民也”,“稷苗高大,喻秦人茂盛也”。^{[62] [P70]}这些意见都看出了“黍稷”意象的国政象征意义。更有甚者,将其中“黍稷”与周族历史作深刻关联,清罗典《凝园读诗管见》:“稷熟最早,为五谷之长而属土,故祠谷神者,以稷配社。五谷不可遍祭,祭其长以该之也。上古以厉山氏之子为稷主,至成汤始易以后稷,皆有功于农事者云。由此言之,则《黍离》之闵宗周,殆思其初开国之后稷也。东迁以后,宗周竟为秦有矣。然有郃之肇基,由来甚远,后之于孙,可无敬念与?《生民》之五章曰:诞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六章曰: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夫秬、秠、糜、芑,皆黍也,即与稷为一类也。在后稷之先,岂必无此嘉种,特以其穡有相之道,则以为后稷实降之,此所由受封有郃,延及后裔,以大啓宗周也。故作者之闵宗周,因行役而见黍,因黍而念其类之为稷,即因稷而念始生是稷之人之为后稷。其言反复三叹,足使弃宗周者闻之,蹙然无以仰对,思文配天之灵也。”^{[63] [P119]}将“黍稷”与祀谷神、后稷相联,以致以之象征周之社稷,这个思路是完全可通的。这种联想也赋予了“黍稷”形象的神圣性和庄严性。

以上述结论重新审视《黍离》诸新说,偏颇源于两种情形。一、没有关注到“黍稷”为周诗惯用意象,跳出其地域特征,“贵族破产说”“旧贵族感伤阶级没落说”“流浪者忧思说”“怨战之作”等皆如是。郭晋

稀先生以为《黍离》反映了史载卫君黔牟流亡周事。为卫人流寓王城,久行不归而作,是《雄雉》的应答篇。^{[9] [P73]}其说较详。然如为卫人表达思国之情,而反复深沉吟诵周之“黍稷”意象,同样有悖情理。^①二、没有关注到“黍稷”的政事象征特征,诸如“寿思兄”、“尹吉甫思子”、“个体流亡的悲苦”、爱情等说,皆局限于家庭伦理情感、个体情感等,与《诗经》中该意象内涵传达的取向相距甚远。

总之,《诗经》“黍稷”传达的文学意义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独特性,神圣性和庄严性,江山社稷是其基本象征义之一,表现周重大政治变动是其基本主题,而《王风·黍离》是《诗经》16首“黍稷”形象相关诗中刻画最详细、精心的,当是《诗经》“黍稷”形象塑造的典型升华。如此郑重的创作态度应与非常重大的政治变动相关,而于周最大的政事莫过于“宗周覆亡”。

然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宗周覆亡”有一个演变的历史过程,非仅指犬戎攻入镐京、平王被迫东迁事。从西周末期,幽王朝政荒唐,国政摇摇欲坠,继而大军日渐压境,大量贵族恐慌、忧虑王城不保,先行匆忙东迁,已为覆亡之肇端。《黍离》诗中未明言创作时间,因此可理解为沉痛缅怀“宗周覆亡”事,也可为深沉预忧。^②又结合诗句“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表达的是一种误解所带来的强烈痛苦,这种痛苦体现的应是情境和作者内心形成的反差。窃以为《黍离》诗的创作可能有三种情形。一是西周覆亡在即,大量贵族为保障家族生命与财富,逃离镐京,仓促东迁。^③在苟且偷生的时代风气中,作者一腔爱国热情,举步维艰,行路迟缓,途中写作是诗。第二种情形,为东迁时所作,申侯与缙、犬戎攻入镐京,“尽取周赂”,镐京遭到极大的破坏,又有边邻犬戎等的威胁,平王在申

① 又,此说提出的主要证据之一是“谓我何求”之“求”与《雄雉》“不忮不求”之“求”,皆“贪求”义。“居人责行者之忮求名利,行人则答以并非封侯念重。”(郭晋稀《诗经蠡测》,巴蜀书社2006年版,73页)然联系“不忮不求”与“谓我何求”两句出处的上下文和语法结构,“求”字义显然不同。“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处“求”字实省略宾语。该句式与《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相同,“求”的对象句子自身有答案;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句式和《臣工》“维莫之春,亦又何求”相同,“何求”即“求何”,“求”的具体内容是未知的。“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其句与《园有桃》“心之忧矣,其谁知之”表达的情感内容一致,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一种异常复杂的痛苦,无人能深切体会。既知求的内容,何来求何?因此两诗之间无法形成应答连接。

② 对此清王心敬有敏锐的感受:“《黍离》一诗,周大夫目见西周之沦废而作,‘二南明西周之所以兴,《黍离》志东周之所由衰。其兴也,以化由中壺;其衰也,以衅作艳妻;而皆起宫帟之间者’。(王心敬《丰川诗说》,《四库存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126页)他认为《黍离》为预忧西周覆亡,这也是将该诗编为《王风》首篇的意义所在。如是当作于西周末。而清崔述则认为该诗作于东迁时:“盖缘说毛诗者,谓王风皆周东迁以后之诗,此篇居王风之首,当为初迁时所作。有此成见在心,故见章首言黍稷,遂以为故宫之禾黍耳。其实王风不必皆在迁后,读者当玩其词以求其意,不得因此遂定以为行役于故国也。曰:然则季札何以谓为周之东也?曰:此不过大概言之耳,非为其必无一二篇在东迁之前也。正如称大雅为文王之德,而大雅岂尽文王之德?称郑风为其细已甚,而有《缁衣》《羔裘》;称唐风为思深忧远,而有《绸缪》《葛生》;其得以为是疑也哉?”(崔述《读风偶识》,《续修四库全书》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266页)此说也可通。今人陆侃如、冯沅君、程俊英的“迁都说”与崔说属于一类。

③ 详见杨宽《西周史》第七编第二章中“秦和西戎的战斗以及周避难东迁”。

侯、晋文公、郑武公的帮助下被迫迁都。途中，离故国渐行渐远，朝廷上下大多为逃离兵灾而庆幸，而作者独忧思故都，不堪承受亡国之痛。第三种情形，当依《史记·秦本纪》所载，作于秦励精图治，收复镐京，将岐以东献周，周派官员赴岐收复失地之时。当他看到故土颓败，想到周权威衰弱，悲从中来，故作此诗以寄忧思。

参考文献:

- [1]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2]蒋立甫. 诗经选注[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1.
- [3]陆侃如, 冯沅君. 中国诗史[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 [4]程俊英, 蒋见元. 诗经注析[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5]余冠英. 诗经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6]褚斌杰. 诗经全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 [7]金启华. 诗经全译[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 [8]李蹊. 从“行迈”的涵义看《黍离》的主题[J]. 诗经研究丛刊, 2005(1).
- [9]郭晋稀. 诗经蠡测[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 [10]蓝菊荪. 诗经国风今译[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 [11]叶知秋. 论《诗经·黍离》为人类千古之问: 我是谁而作[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6).
- [12]刘德焯. 《黍离》: 奴隶的号叫[J].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3).
- [13]李显赫. 刍议《诗经·黍离》主旨[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1(12).
- [14]舒相军. 《王风·黍离》新解[J]. 怀化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1).
- [15]孔颖达. 毛诗注疏[M].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明汲古阁本.
- [16]魏了翁. 毛诗要义[M]//续修四库全书: 20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7]丰坊. 鲁诗世学[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山东: 齐鲁书社, 1997.
- [18]朱熹. 诗集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19]严粲. 诗缉[M]//文渊阁四库全书: 75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20]朱善. 诗解颐[M]//文渊阁四库全书: 78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21]谢枋得. 诗传注疏[M]//续修四库全书: 57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22]刘瑾. 诗传通释[M]//文渊阁四库全书: 76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23]曹学佺. 诗经剖疑[M]//续修四库全书: 60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24]沈守正. 诗经说通[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25]王质. 诗总闻[M]//文渊阁四库全书: 72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26]季本. 诗说解颐[M]//文渊阁四库全书: 79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27]姚炳. 诗识名解[M]//文渊阁四库全书: 86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28]李光地. 诗所[M]//文渊阁四库全书: 86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29]刘毓庆. 诗义稽考[M]. 石家庄: 学苑出版社, 2006.
- [30]朱谋埠. 诗故[M]//文渊阁四库全书: 79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31]傅恒等. 御纂诗义折中[M]//文渊阁四库全书: 84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32]刘向. 新序校释[M]. 石光瑛, 校释. 陈新, 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33]牟庭. 诗切[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3.
- [34]冯登府. 三家诗遗说[M]//续修四库全书: 76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35]李昉等. 太平御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36]范家相. 三家诗拾遗[M]//文渊阁四库全书: 88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37]毛奇龄. 国风省篇[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38]方苞. 朱子诗义补正[M]//续修四库全书: 62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39]皆川愿. 诗经绎解[M]. 府立图书馆藏明治写本.
- [40]胡文英. 诗经逢原[M]//四库未收书辑刊.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 [41]潘克溥. 诗经说铃[M]//四库未收书辑刊.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 [42]姜炳璋. 诗序补义[M]//文渊阁四库全书: 89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43]顾镇. 虞东学诗[M]//文渊阁四库全书: 89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44]胡承珙. 毛诗后笺[M]//续修四库全书: 67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45]康有为. 诗经说义[M].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79.
- [46]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47]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48]李资乾. 诗经传注[M]. 日本尊经阁藏明崇禎癸酉序刊本.
- [49]王鸿绪.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M]//文渊阁四库全书: 83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50]李诒经. 诗经蠹简[M]//四库未收书辑刊.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 [51]方玉润. 诗经原始[M]//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52]李樾, 黄樾. 毛诗李黄集解[M]//文渊阁四库全书: 71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53]许伯政. 诗深[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54]范处义. 诗补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 72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55]顾起元. 诗经金丹[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下转 25 页)

究方法更是被大力提倡与广泛运用。循此,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就不应该完全忽略那些具有史识价值的边缘性材料,而这些材料作为辅助和旁证往往又能证史或者补史之缺。前贤早有“六经皆史”之说,近来亦有时修提出“一切史料都是史学”,主张还要涵盖尚未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10]。这些论说成立与否之关键和前提,反映到微观层面,即要求分析的文本和探讨的对象客观具有史料及史识价值。合理利用好史学研究中的“旁证”,更有助于拨开历史迷雾,丰富历史画卷,甚至于廓清历史真实。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 李剑波

- [1]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2]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胡三省, 音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3]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 董诰等.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5] 苏辙. 栞城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6] 来森华. 晋武帝时期的政治生态与皇室赋诗活动[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
- [7]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8] 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9] 何焯. 义门读书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0] 罗新.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N]. 文汇报 2018-04-13(W02).

(上接 20 页)

- [56] 郝敬. 诗经原解[M]//续修四库全书: 58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57] 蔡卞. 毛诗名物解[M]//文渊阁四库全书: 70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58] 黄中松. 诗疑辨证[M]//文渊阁四库全书: 88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59] 游修龄. 论黍和稷[J]. 农业考古, 1984(7).
- [60] 刘玉汝. 诗缙绪[M]//文渊阁四库全书: 77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61] 徐光启. 毛诗六贴讲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62] 牟应震. 诗问[M]//续修四库全书: 6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63] 罗典. 凝园读诗管见[M]//四库未收书辑刊.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吴道勤